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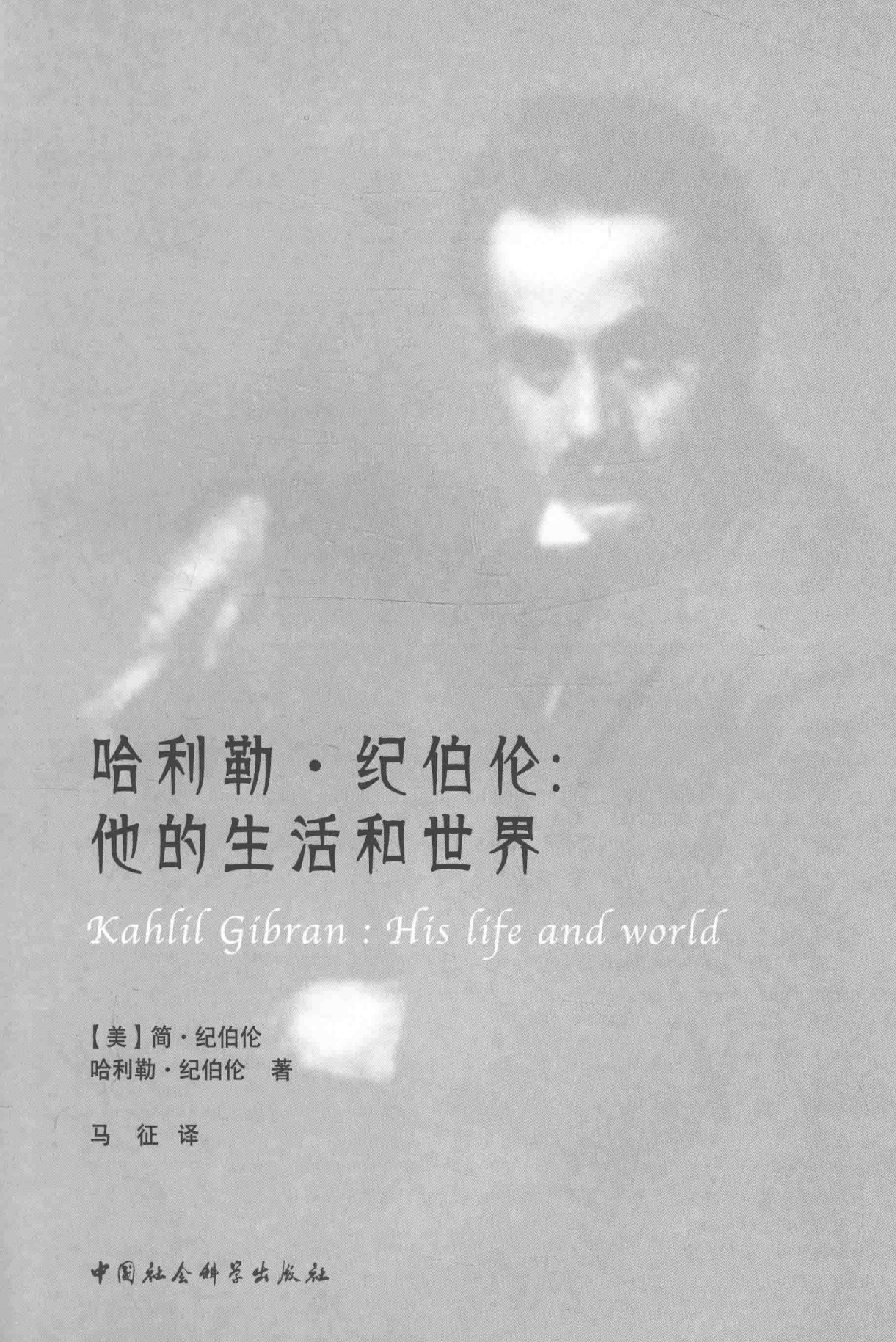
【美】简·纪伯伦
哈利勒·纪伯伦 著

马 征 译



哈利勒·纪伯伦： 他的生活和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哈利勒·纪伯伦： 他的生活 and 世界

Kahlil Gibran : His life and world

【美】简·纪伯伦
哈利勒·纪伯伦 著

马 征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1-24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美)简·纪伯伦,(美)哈利勒·纪伯伦著;马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

书名原文:Kahlil Gibran:His Life and World,Interlink Books,1998

ISBN 978-7-5161-8526-1

I. ①哈… II. ①简…②哈…③马… III. ①纪伯伦,K.(1883—1931)—传记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5251号

Copyright © Jean & Kahlil Gibran 1981,1991,1998

Copyright © New York Graphic Society Ltd,1974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3.5
插页 2
字数 550千字
定价 9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阿拉伯语言和文化的翻译得到了美国
米勒斯维尔大学的阿布德尔哈迪·哈拉瓦
教授（Abdelhadi Halawa）的鼎力协助，
特此致谢！

译者序

作为历史、思想和文化标本的纪伯伦

与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现代艺术家心目中那位“空降”于纽约、讲着流利英语、风度翩翩、举止得体的“世界公民”形象不同，更与一些美国评论者在纪伯伦成名后所渲染的“生来好运”“在爱、美和富足的氛围中长大成人”这一“纪伯伦神话”^①不同，纪伯伦是 20 世纪初期第一代阿拉伯移民的缩影，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成长史代表了 20 世纪早期阿拉伯移民的奋斗史。

1883 年 1 月 6 日，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的小山村贝舍里，这个小山村世代变换，文化更迭，埃及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十字军东征时的欧洲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曾统治过这里，但这里的人们却“幸免于侵扰，孑然不变，他们传承着自己的田园生活，生老病死，世代沿袭”，^②这里从 5 世纪开始信奉基督教马龙派，而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的贝舍里，与中东的其他地区近似，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屠杀并未出现，他们之间的通婚、交往非常普遍，纪伯伦母亲的祖父一代，便是穆斯林。^③纪伯伦成长的这种宗教和文化多元背景，从根本上解释了纪伯伦文学中的宗教和文化的统一性思想。

童年的纪伯伦生活在一个缺少稳定和爱的家庭环境中，父亲老纪伯伦自负任性，好赌善饮，而母亲卡米拉公然违抗，毫不妥协。于是，童

① 见本书第二十二章。

② 见本书第一章。

③ 同上。

年时代的纪伯伦便从乡村美景和内心世界汲取力量，贝舍里乡村四处可见的山峦、遗迹、河流与雪松林，激发了他浪漫主义的想象，成年后，这些美景成为他作品中田园诗般的绝美回忆。而这里世代口耳相传的基督教的传说与奇迹，传奇、故事和歌谣使古代圣徒和圣人的故事成为纪伯伦后来创作的一个重要资源。

1895年6月，因丈夫被捕、房产没收而深感耻辱的卡米拉，带着两子两女加入了世纪之交的移民大军，哈利勒·纪伯伦是卡米拉的次子，时年12岁。与众多早期阿拉伯移民一样，他们居住于美国第二大移民聚居区波士顿南恩顿（South End）边上的奥利佛（Oliver Place），现在的奥利佛是“中国城”的一部分，当时居住着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移民，贫穷、低贱而又拥挤不堪。^①

纪伯伦终身视这段棚户区经历为“污点”而闭口不谈，甚至“用想象的故事来虚饰奥利佛区的悲惨生活”，在他编织的故事中，他有着出身高贵的父母和享有特权的童年，他甚至在脑海中以某种方式抹去了自己早年的真实生活。^②但这个充斥着贫穷、疾病和死亡的移民区，确实是纪伯伦美国生活的起点，在这样的环境中，美国的公立教育制度和慈善制度，成为众多移民孩子“汇入美国洪流”最重要的媒介。

1895年9月30日，作为家中唯一一位入学的孩子，纪伯伦进入居住区附近的昆西学校读书，昆西学校的生源复杂，涵盖了居住于南恩顿的爱尔兰人、美国人和犹太人，还有少量的中欧、东欧和中国人。^③纪伯伦进入一个“专为需要零起点学习英语的移民孩子设置”的不分级的班，在这个至少有六种不同语言的班级里，纪伯伦成绩优异，尤其在素描和绘画方面表现突出。

在波士顿移民区丰富、庞杂、来自不同国度的街区文化中，在世纪之交波士顿城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现代大众文化中，少年纪伯伦接触到了完全不同于黎巴嫩山村的一个“新世界”，然而，如果不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新慈善”事业的发展，纪伯伦或许会难以摆脱

① 见本书第二章《城市旷野》。

② 同上。

③ 同上。

“小商贩”的命运。

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新慈善”革新的开创时期，“新慈善”主要建立在“重建”的原则上，其目标是“从这个区域自身的物质和所蕴含的内在生命力出发，建构更好的生活”。^① 1896年11月25日，慈善工作者杰西·弗莱蒙特·比尔小姐给富有的波士顿文化名人弗雷德·霍兰德·戴伊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纪伯伦这名展现出绘画天赋的移民孩子，她的推荐信贴切地映射出那个时代的纪伯伦作为一名移民孩子的“幸运”：

我亲爱的戴伊先生：

……不知你是否碰巧有一位搞艺术的朋友，可能会对一个叫哈利勒·纪——的叙利亚男孩儿感兴趣。他与任何社团都没有联系，因此，无论谁和这小伙子交朋友，他都能按自己的评判和智慧来规划他的未来。去年冬天，他闲逛到泰勒街上，上了一次绘画课，他所表现出的绘画才能，足以使皮尔斯小姐相信，如果有人愿意帮助他得到艺术方面的教育，他有一天就能够以更好的方式谋生，而不是在大街上卖火柴或报纸。

如果我们不去立即帮助他，他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街头混混。他与家人居住于奥利佛，极度贫困，如果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的家人会在法律允许时，让这小男孩儿工作以贴补家用。明年他就14岁了，超出了上学的年龄，因此情况允许的话，我们特别希望让这小家伙儿今年能开始绘画。

（本书第二章 城市旷野）

弗雷德·霍兰德·戴伊是响应“新慈善”号召、经常拜访南恩顿移民区的文化名人之一，是1890年代活跃于波士顿“病态世纪末”的波西米亚艺术群体的核心成员，这是一个“遭人非议的灵性群体”，“夜半宴饮，放纵调情”，视行为和艺术为一体，以行为描画艺术，视艺术为灵魂的给养。戴伊的写作技巧和语言表达庸常，却具有非凡的现

^① 见本书第二章《城市旷野》。

代审美力，是推动美国现代主义运动“小杂志”的早期创办者。在戴伊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小杂志《桃心花木》（The Mahogany, 1892年1—7月）末期刊载的一段话，形象地表明了纪伯伦即将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对物质主义的轻蔑”和“以反叛寻求精神的救赎”而著称，而这将成为纪伯伦文学和艺术精神的基点：

世界出于自身的利益，以过快的速度运行。对于那些要改良这自以为是的19世纪文明的人来说，这速度显得尤其快……我们一直尝试着去变革这个世界，扭转人们疯狂的拜金主义，我们抽雪茄，阅读奥斯卡·王尔德；我们反对电车、自行车和豪威尔斯先生；我们玩儿通灵，因为我们发现那很有趣；我们褒扬乔治·梅瑞迪斯先生，因为我们对他怀有诚挚的敬意；我们歌颂香烟和咖啡，并非由于它们自身的缘故，而是由于它们代表了对这个时代的反抗，这个时代将生活变成特快列车，并使人未老先衰。

（本书第三章 病态世纪末）

戴伊引领纪伯伦进入的这个弥漫着现代主义精神的精英群体，将会对纪伯伦的文学理念和生活态度产生根本的影响。他在作品中对精神和空灵世界神秘主义的描绘、弥漫着浓浓思乡情绪的东方图景、他在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他要“手捧着火焰”“不眨眼地看太阳”的生活态度——是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幸福观的叛离，这些文学、艺术和生活观念从根本上来自于他少年时代所见到的波士顿的现代主义者们。

1893年，戴伊和赫伯特·科普兰合作，成立了“科普兰和戴伊”出版公司，在五年半的运行时间里，公司共出版了98本书，不仅引介了莱昂纳尔·约翰生、爱丽丝·梅尼尔、威廉·巴特勒·叶芝等英国诗人的作品，与英国出版商合作出版了马修斯和莱恩主编的十卷本《黄皮书》，而且还推介了斯蒂芬·克雷恩等现代美国作家的作品。当时的纪伯伦几乎不懂英语和阿拉伯语，但戴伊经常给他读书，在他的引导下，纪伯伦发现了文学、艺术和思想的世界。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谦卑者的财富》、英国学者约翰·兰普里尔的古典神学著作《古典辞典》、布莱克、比尔兹利和波恩·琼斯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纪伯伦影响

最大。有艺术天赋的纪伯伦，甚至在14岁时就参与了“科普兰和戴伊”出版社所发行图书的封面设计，而通过出版社的活动和戴伊的引荐，纪伯伦得以自由出入于波士顿精英艺术家群体，这个群体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先锋性的文学和艺术理念预示了纪伯伦此后一生的生活、文学和艺术精神：

（戴伊）悉心培植的百合花和玫瑰，并未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小哈利勒将会把这些最初和最重要的艺术影响，移植到他自己简朴的雪松之茎上。多年以后，当人们已遗忘艾里斯·布朗的《牧地草》、泰伯神父的《诗集》和露易斯·奎尼的《路标》，年轻的哈利勒却仍能回忆起他们的精神并效仿他们。移民所造成的文化混杂，将对哈利勒·纪伯伦产生复杂的影响，而这些都来自弗雷德·霍兰德·戴伊的遗赠。

（本书第三章 病态世纪末）

更为重要的是，戴伊通过他的摄影艺术，还向纪伯伦展示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来自西方人对黎巴嫩和近东经久不息的浪漫主义想象，从根本上塑成了纪伯伦的人格和创作基调。

戴伊前往移民聚居区，并不仅仅出于慈善的目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喜欢移民区那“令人炫目的地方色彩，街区孩子们的多种族特点给予他灵感，促使他尝试彩色摄影的新艺术实验。意大利人、中国人、黑人和地中海人都令他着迷，他秉着严肃的态度，去寻找新的和有趣的模特”。当时的戴伊所进行的摄影实验之一，是要找到“最具有震撼力、不寻常和奇异生动的模特类型——黑人、白人和黄种人，在相机前摆各种姿势”。

戴伊对纪伯伦这位“安静、橄榄色皮肤、褐色眼睛”的叙利亚男孩儿自然特别满意，而他的拍摄给少年哈利勒留下了微妙却又是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迹，这一精神印迹将会持续在纪伯伦一生的文学创作中：

……戴伊让他穿上神秘的阿拉伯长袍，就像他让亚美尼亚人裹上头巾，让黑人穿上埃塞俄比亚华服，让中国人拿着长笛，让日本

人穿上和服。这些孩子们并不仅仅将这当作假扮游戏，经由戴伊的镜头，这些贫民区的流浪儿发生了魔幻般的转型。他们变成了“亚美尼亚王子”“埃塞俄比亚头领”和“年轻的酋长”，这些称谓赋予孩子们从未有过的特权和高贵感。而哈利勒尤其强化了这一自我形象，并幻想着自己高贵的出身，以此来抵御现实的窘迫。在戴伊高贵的标签下，他不再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街区的贫民窟中的孩子，他在戴伊铂金镶框的照片中所看到的闪光的自我形象，蕴涵着更丰富的内容，这一年里，他竭力使自己符合戴伊照片中的形象。

（本书第四章 年轻的酋长）

1898年，纪伯伦返回黎巴嫩，在贝鲁特马龙派教会学校“马德拉赛特·阿·希克玛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已在波士顿艺术圈见闻广博的他，在黎巴嫩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自信，通过学习，他的阿拉伯语写作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赢得了“校园诗人”的称号。

1902年，在黎巴嫩完成阿拉伯语学习的纪伯伦回到美国，在途经巴黎时得知妹妹桑塔娜的死讯。随后一年的时间里，刚回到家中的纪伯伦，亲眼目睹了哥哥和母亲因患病而离世。在他生命中最痛苦的岁月，美国浪漫主义女诗人约瑟芬·普林斯顿·皮勃迪给予了纪伯伦精神上的抚慰。这位美丽的“缪斯女神”认为纪伯伦“具有不可战胜的创造精神”，她帮助纪伯伦举办第一次画展，允许纪伯伦走进自己的私密世界，他们之间所营造的那个浪漫的理想世界，帮纪伯伦挨过了他生命中最无助的时光。而更重要的是，她对纪伯伦的浪漫主义想象，映射了西方人对“圣经所述之地”经久不息的记忆，也映照了纪伯伦这位黎巴嫩“天才”多得“贵人襄助”的秘密。

1902年12月，初识纪伯伦的约瑟芬瞬间被纪伯伦吸引，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最好的朋友将会成为什么？这是最难以预料的事，其中有三个理由：这男孩儿是叙利亚人；他也是一位绝对富有天才的先知；我不记得第三个理由，但理由远远不止三个。”约瑟芬经常在日记和书信中称呼纪伯伦为“我的天才”“先知”……

事实上，当约瑟芬最初看到纪伯伦给她的画像，当她听戴伊讲述纪伯伦来自黎巴嫩的东方身份，她便已相信“这个男孩儿生来就是一名

先知”，当时已出版一部诗集的约瑟芬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这位 15 岁男孩儿的最初印象，这段话很能代表纪伯伦所遇到的一位位美国庇护者和崇拜者的心理：

……我明白，他（戴伊）和我一样相信——这男孩儿生来就是一位先知，确实如此。他的画比任何事物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年轻人无法逃避。你满怀欣赏和喜悦的欢欣，（这是）极大的精神拥有。通过每一幅草图和每一种感觉，你能看到一位来自阿拉伯本土的有预言能力的智者。感谢我看到这些的那一天，因为我遇到了与上帝如此亲近的一个生灵，没有什么如此温暖过我的心，振奋了我那在黑暗中逐渐迷失的思想。

1902 年 10 月，纪伯伦要求与约瑟芬进一步发展男女之间的情谊，他们之间带有明显浪漫色彩的短暂关系结束了，这再次印证了约瑟芬对于纪伯伦的“爱”，是出于一位西方“恩主”对一位来自“圣地”的少年天才的赏识与浪漫想象，这与当时波士顿精英群体迷恋东方和神秘事物的风尚密不可分。然而，作为纪伯伦早期创作与生活中的“缪斯女神”，约瑟芬的感伤、浪漫和非凡的想象力，对纪伯伦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903 年，纪伯伦暂时放弃了自己“仍然难以驾驭的”英语，开始在纽约的阿拉伯语报纸《移民》上发表阿拉伯语短文，1905 年，纪伯伦出版第一部阿拉伯语作品《音乐短章》。纪伯伦的阿拉伯语创作采取了口语的形式，受到阿拉伯移民读者的喜爱，本书作者的分析极富启发性：

贝鲁特的四年学院生活，没能完善纪伯伦的阿拉伯语写作能力，也没有记录表明，他与波士顿的任何一位阿拉伯语学者保持着友谊，的确，他与叙利亚群体没有形成密切的联系，于是，当他写下自己的思想，他被迫求助于农民的耳朵。他忽视传统词汇和古典阿拉伯语形式，从贝舍里孩童时代和南恩顿街区所体验过的普通语言中汲取资源。他使用口语，并非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而是由于

他疏离于正统的阿拉伯语文学，然而，他对作品语言独特和简约的处理方式，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阿拉伯移民，他的很多读者几乎不认识自己的母语，因而他们能认同和接受纪伯伦无意中对阿拉伯语的现代化。

（本书第八章 奇怪的音乐）

1906年，纪伯伦出版阿拉伯语小说集《草原新娘》，作品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底层社会人物，表达反教会的主题，与当时阿拉伯文学的矫揉造作和形式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迅即引起了纽约移民作家的注意。

1903年，纪伯伦在戴伊的工作室第一次举办画展，同时也遇到了对他的人生与职业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玛丽·伊丽莎白·哈斯凯尔。哈斯凯尔小姐客观地记录自己生活的写日记习惯，将记录下她与纪伯伦延续一生的爱情、友谊与合作，为后人呈现珍贵的纪伯伦研究资料，而纪伯伦与玛丽持续一生的通信，不仅是研究纪伯伦创作和生活的重要文献，而且早已成为书写爱情、友谊的世界名篇，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广为流传。当然，关于纪伯伦和玛丽之间的关系，也一直被纪伯伦传记作者们津津乐道，这位年长纪伯伦十岁的美国知识女性，与纪伯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与其他纪伯伦早年的美国欣赏者一样，玛丽同样对纪伯伦的天赋深信不疑，她甚至用“转世轮回说”来描述纪伯伦的天才，在她看来，“布莱克死于1827年，罗塞蒂出生于1828年；罗塞蒂死于1882年，而纪伯伦生于1883年”。但与其他美国庇护者不同，玛丽打破了纪伯伦的“天才”神话，更为理性客观地看待纪伯伦，第七章《优雅和新奇头脑的画廊》记述了玛丽与此前纪伯伦众多的美国庇护者的差异：

此前的纪伯伦一直被一个矫揉造作的群体宠爱着，他从这个群体中学习，并受到约瑟芬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滋养。而此时的他，可能厌倦了自己这种像猴子一样被耍弄的角色，他需要得到某个人实用性的分析和指导。玛丽·伊丽莎白·哈斯凯尔理智而又不易动感，于是，她便被赋予了这一新的角色。

玛丽开始审阅、修改纪伯伦阿拉伯语作品的英译稿，1908年春，纪伯伦将玛丽修改后的英文译作《死之美》发表在《移民》报纸，这是二人长期文字合作的开始。自此，玛丽将成为纪伯伦一生的经济资助者、文学和艺术上的崇拜者和合作者。

1908年7月1日，哈利勒在玛丽的资助下，前往巴黎学习艺术。在巴黎期间，纪伯伦出版了另一部阿拉伯语短篇小说集《叛逆的灵魂》，赢得了广泛关注，巩固了他在美国阿拉伯移民作家中的地位。

当时的巴黎是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心，各种各样的“先锋”艺术层出不穷，产生和吸引了众多世界级的艺术家。纪伯伦曾居住在巴黎著名的先锋派艺术家聚居地蒙特马高地，亲身感受了先锋艺术狂放自由的精神。纪伯伦从威廉·布莱克、尼采、卢梭、伏尔泰的作品中汲取营养，为后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思想储备。其中尤为重要是布莱克和尼采的影响，在读了布莱克的作品后，纪伯伦感到他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姐妹”。而在纪伯伦看来，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巴黎学习期间，纪伯伦延续了他在早期波士顿时期所接受的象征主义作家的影响，选择性地接受了象征主义的绘画理念。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一系列“绘画作品，画出他们时代的伟大艺术家——现代艺术和文化的支柱……”这项延续一生的工程，使纪伯伦以独特的方式接触了众多现代艺术家、文学家和思想家。1910年6月，哈利勒结识了另一位移民作家艾敏·雷哈尼，年长的雷哈尼在当时的美国和阿拉伯文坛享有更大的知名度。

1910年，纪伯伦返回波士顿，向玛丽求婚，为了和玛丽的婚姻，纪伯伦做出种种努力，但年龄的差距和社会背景的悬殊，使玛丽对二人的婚姻摇摆不定，后来他回忆道，玛丽的冷静和毫无激情，沉重地打击了他的骄傲：

我从巴黎回来，全是对你的爱。我那么简单、率真和真诚地把全部的心灵给你，我只是一个孩子，将全部的我放在你的手里，但你却对我那么冷淡，忧心忡忡……在巴黎，我一直能感受到你的信任和温暖；我回到波士顿，仍然觉得你是那么甜蜜、善良和美

好——然而当那天我向你提到婚姻，你便开始伤害我。

这是纪伯伦第二次对婚姻的努力，但玛丽坚决地拒绝了他，经过理性的思考，选择了婚姻可能之外的恋人关系。在纪伯伦临去世前，他还曾对自己缔结婚姻做出了第三次努力，但仍然没有成功。纪伯伦一生的三次“求婚”和为稳定的婚姻生活所做出的努力，应为后人所诟病的纪伯伦的生活方式提供一种很好的反击：一个一味地追求波西米亚自由不羁的感情生活的纪伯伦，怎么会在一生中三次求婚呢？

玛丽曾在日记中忠实地记录了她和纪伯伦之间的关系，这段文字解释了二人最终在经济资助和工作合作中形成的灵魂伴侣关系，而也正是由于要达成更大的自我、结成这样的灵魂伴侣关系，二人克服了金钱关系所带来的困扰，结成了工作上的合作关系：

关于在金钱关系上我们的“小自我”所遭受的痛苦，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谈得更坦白和全面——对我而言，那是我想要的那种爱的障碍，对他而言，他不确定在我未来的岁月里，我是否还会有足够的积蓄，他认为我正失去自我。他说，他的阿拉伯语作品并不比绘画作品少，那是给我的礼物——“你曾意识到这一点吗？”

“没有。”

“你给了我文学生命，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不能做这项工作，我无法活下去，”哈说。

“但如果你死了，你就不会遇到灾难，如果你不在我的生命里，我却还活着——那个生命要微小得多，那会是灾难。”

我们都那样看待我们的合作，从商业效果看，我们的合作很可笑，因为我们不断地变化——但从更大的方面看，那是一种智慧……我认为，我们几乎不再有对金钱的痛心……因为它只是为了使成为内心的伴侣，当我们一起朝着“大自我”成长，我们发现我们变得越来越完整。

（本书第十五章 征服纽约）

1911年5月，纪伯伦出于事业发展的考虑，迁居当时美国的新兴

文化中心纽约，并居住在纽约的艺术家聚居区格林威治村。在这个新兴的现代主义艺术中心，纪伯伦得以和众多文化名人接触，这使他能敏锐地把握最前沿的文学趋势和时代脉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迁居这个新兴都市，纪伯伦“逃离”了早期波士顿那个世纪末群体给他打下的文化烙印，传记作者通过无意中发现的史料，令人信服地分析了纪伯伦迁居纽约的心理原因：

……在理解纪伯伦作为一位不断发展的艺术家的人格特征时，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总是不断地表现出对自己的双重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焦虑。在当时的世纪之交，他的“东方”风格和气质，曾令波士顿的精英美学家们着迷，崇尚和追寻富有诱惑力的“欧玛尔·海亚姆文化”是一种风尚。然而，后来的纪伯伦不适应这种婆罗门式的家长作风，因为这使他畏惧自己会停滞不前。无疑，当他长大成人，他开始对自己一成不变的“叙利亚天才”的标签怀有敌意，他不再满足于做阿拉伯风尚的点缀品，也不愿再用行为去迎合“黎凡特”或“东方”英才的普遍概念，对于贬低自己和自己的文化，纪伯伦感到厌倦，他决定离开波士顿，到一个更为都市化、更少有先入之见的地方去，使他不再像早年一样认同“一成不变的东方”的普遍认识。事实上，近代的先验主义者，也就是那些喜爱他的外表和出身，并给他拍照的“灯塔山”的东方主义者，其实是他成功逃离的小群体。

——本书后记

1913年4月，阿拉伯社团第一份文艺类杂志《艺术》首期在纽约发行，杂志反映了纪伯伦的趣味与风格，他的设计、插图、散文诗和文章，令杂志别具一格，而他第一年在期刊上发表的很多诗作，成为后来《疯人》写作的核心。他还开始创作一系列关于前伊斯兰和伊斯兰诗人与哲学家的文章，并发表一些想象性的绘画作品。经由他的作品，阿-麦阿里、伊本·阿·法里德、伊本·哈尔丹、阿-加扎里、伊本-阿-穆卡法和伊本-西拿被介绍给了大多数阿拉伯基督徒读者。

1914年12月，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蒙特罗斯画廊所举办的画展，叩

开了纪伯伦“征服纽约”的大门。1916年，著名的小杂志《七艺》（*Seven Arts*）创刊，这家刊物邀请了瓦尔多·弗兰克、凡·威克·布鲁克斯、罗伯特·弗罗斯特、罗伯特·埃特蒙德·琼斯等后来“名留青史”的美国作家参加，纪伯伦是顾问委员会中的唯一一名移民代表。而尤金·奥奈尔、D. H. 劳伦斯、舍伍德·安德森、西奥多·德莱赛、约翰·多斯·帕索斯和 H. L. 门肯这些将成为“美国文学史中光芒四射的名字”，都是《七艺》杂志的作者。纪伯伦《疯人》中的大部分作品，最初都首先在《七艺》上发表，在《七艺》发表一系列作品，也使他开始得到纽约文学界的关注与认可。

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纪伯伦精神和创作上的“双重时期”。一方面，民族主义立场使他希望借助于战争使黎巴嫩和叙利亚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也支持他的那些持和平主义信念的美国朋友们，这两个世界的差距，成为他“每日不得不跨越的鸿沟”。他对两个世界的矛盾态度，表现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疯人》与《先行者》中。1912年，他写给玛丽的一封信，充分表明了他在这时期对待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心态：

我一直因欧洲的这些过分冷静的话语而感到疲倦和恶心，因为他们自己拥有自由与平和，他们便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之满足。玛丽，在幸福人们的乐观主义中，有一种冷酷。富有和幸福的人们反对巴尔干政权，因为他们害怕那可能会“打破了世界和平”——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打破这虚伪的世界和平？他们已经在单方面的和平中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我祈祷上帝，这次战争有可能会带来土耳其帝国的分解，以至于那些贫穷的、被压榨的近东国家能够再次存活……我不是爱国主义者，玛丽：我是一个过分的绝对主义者，绝对主义思想里没有国家——但我的心仍为叙利亚燃烧。命运一直对她太残酷了……她的众神已死，她的孩子离开她，到远方的国度寻找面包……然而，她却仍然活着——那是最痛苦的事情。

（本书第十七章 战争年代）

玛丽协助纪伯伦进行英语文学创作的语言润饰和思想沟通，在这样一种合作关系中，1918年10月，纪伯伦的第一部英语著作《疯人》出版，这部作品的出版，使纪伯伦在美国文学界声名鹊起，同时也标志着玛丽对纪伯伦长期英语语言训练的结束。随后，已停刊的《艺术》杂志的主编纳西布·阿里达出版了纪伯伦的阿拉伯语长诗《行列》，而1920年出版的《先行者》，其英语表述已经不再需要玛丽的任何校正，在玛丽看来，纪伯伦的英语是自己所见过的“最出色的”，“不需要改动一个字”，而在纪伯伦看来，他过去的一切写作，似乎都仅仅是培训他的学校，他要以自己的“全部存在”“进入《先知》”。^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纪伯伦逐渐放弃了自己要直接参与战斗的政治幻想，将自己的艺术创作作为参加祖国战斗的“最好形式”，参与和组织了一系列具有政治色彩的救助活动。1919年2月的巴黎和平会议期间，他告诉玛丽：“无论巴黎发生什么，我和许多叙利亚人一起，会为国家而战斗。或许战斗的最好形式是绘画和写诗。”^②整个20世纪20年代早期，纪伯伦坚持这一主张。1920年4月，著名的阿拉伯旅美作家团体“笔会”成立，纪伯伦任会长。1920年《你有你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在《年轻女性》上发表，在随后四年间，纪伯伦还发表了系列相关思想的作品——通过语言、写作和人们的创造活动，使阿拉伯文化重获新生。

20世纪20年代后，已在文学界得到广泛认可的纪伯伦，思想上发生了“质”的转变，在1921年写给玛丽的一封信中，他袒露了这种转变：伴随他一生的、追寻自我身份的痛苦和矛盾，已经让位于一种圆融的整体性目标：

我过去常常认为，我是另一个碎片——不同于其他一切生命——我所写的一切作品，都是要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孤独。但那其实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独和与众不同的。现在我明白，我是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一个坛子的一个碎片，不是

^① 见本书第十九章。

^② 同上。